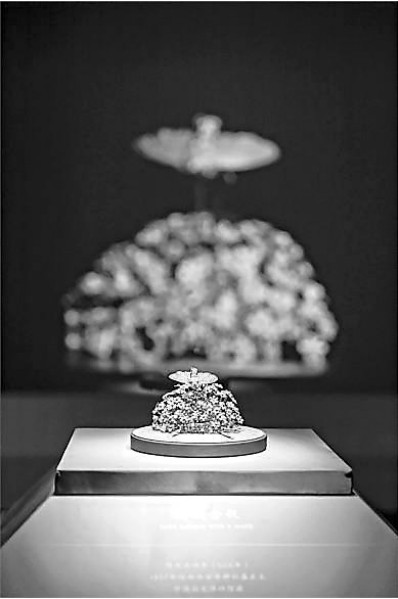


隋朝为何这么富？



“李静训和她的时代文物展”上的“闹蛾金钗”

“此墓虽只葬一九岁小女孩，但相当豪华奢侈，出土遗物都很精美，且有许多器物为研究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好材料。”在《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葬发掘简报》中，最后一段这样写道。

因国家博物馆推出的“李静训和她的时代文物展”火爆，李静训（字小孩）这位1400多年前去世的小女孩成了焦点人物。

其实，自1957年李静训墓被发现以来，谈到东西方交流史、隋唐物质文明史、中国玻璃发展史等，必提该墓文物。其中两件玻璃器（隋绿玻璃盖罐、隋绿玻璃小瓶）被列入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目录》，就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隋是短命王朝，国祚仅38年，李小孩去世后10年，隋便灭亡了，可她的墓中呈现的物质文明成就如此辉煌，引人好奇：为何隋朝能这么富？它是如何做到的？

在李静训墓中，还藏着许多谜：隋律“在京师葬者，去城七里外”，为何李小孩葬在城内（李静训墓是目前发现的、隋代唯一的城内墓葬）？李小孩非佛教徒，为何葬在尼寺中？在墓志中，为何她的外祖母杨丽华用前朝（周）封号“周皇太后”，不用当朝（隋）给她的封号“乐平公主”？墓中那些带有异域风情的文物是如何来到中原的？

本文依据雷依群的《隋朝的殷富与隋政府的农业政策》、刘晏裙的《隋代玻璃器的兼收并蓄与自我发展》和王古今的《重读李静训墓——以其早夭为中心》，试予解读。非转引处，一律称墓主为李小孩。

突厥称杨坚是“土豪王”

元初史家马端临说：“古今称国计之富者，莫如隋。”但他也不明白其中原因：“考之史传，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。”在相当时期，主流观点称隋压榨百姓更甚，以致暴富，但也使其速亡。

学者雷依群则认为，隋富来自

政策对头，特别是广泛实行了均田制。

所谓均田制，指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，一般情况下严禁买卖，是防止土地兼并、保护小农持续生产的好办法。均田制始于北魏，太和九年（485年）推行，但隋朝更深入。

首先是取消了“耕牛受田”的规定。北魏时，一头牛可受田30亩（最多4头牛，即可受田120亩，当时一亩约等于今0.5至0.7亩），北齐时可受田60亩（最多受田240亩），地方豪民的耕牛多，小农家庭几无，名为均田，实为富户多占田。

其次是军人受田。此前兵农分开管理，府兵无私田，只能在公田中参加集体劳动，隋把军人编入民户受田，“凡是军人，可悉属州县，垦田籍账，一与民同”。府兵平时生产，战时出征，增加了农业劳动力，政府税收也增加了。

其三是取消了女性和奴婢的受田。豪门多奴婢，动辄数千口，奴婢无人身自由，只能依附于领主，领主则以他们名义大肆占田，形成隐性兼并。

与前朝相比，隋朝还大大降低了税负。比如明确规定：“减调绢一匹为二丈。”北齐、北周的一匹均为四丈。此前18岁以上男子每年服1个月徭役，隋朝则推迟至21岁，且役期减为20天，并规定“百姓年五十者，输庸停防”，即50岁以上服徭役，不用当兵。

与民休息，传统的小农经济就能较快恢复，隋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局面，特别是对富庶的南方进行了大开发。到隋炀帝时，“户口益多，府库盈溢”“诸州调物，每岁河南至潼关，河北至蒲坂达于京师，相属于路，昼夜不绝者数月”。学者何德章称隋朝的统一为“先进文明的胜利”。

隋朝的富裕，突厥也知道。突厥称隋文帝杨坚为“莫缘可汗”，此后的刘武周、梁师都曾被突厥号为“定杨可汗”“大度毗伽可汗”，唐太宗李世民是“天可汗”。“莫缘”来自突厥语，其意有多种说法，即：圣人、国土无限、好运气，乃至佛教中的无缘。从对音看，最接近的还是“富”。“莫缘可汗”相当于今人说的“土豪王”。

李小孩墓葬这么奢华，确有“土豪”风采。

“喜胡风”是李小孩家的传统

隋之前，主导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秩序的是突厥。北周、北齐都曾向突厥纳贡称臣，后来的唐朝亦一度如此，所谓“竭生灵之力，供其来往，倾府库之财，弃于沙漠，华夏之地，实为劳扰”。

隋文帝篡位后，断绝岁贡，突厥遂于开皇二年（582年）、开皇三年（583年）两度入侵中原，均被隋军打败。突厥由各部落组成，大小可汗各自为政，在隋的强势冲击下，

分裂成东西二部。东突厥臣服于隋，隋与其和亲，隋的安义公主、义成公主先后出嫁东突厥，加上信义公主出嫁西突厥，隋取得丝绸之路东段的主导权。“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”，最多时达40余国。

李小孩家族出自鲜卑，长期盘踞在原州（今宁夏固原），是胡商入华的必经之路，当地多粟特移民，他们善经商、作战勇猛，是李家盘踞一方的班底。李小孩的太爷爷李贤的墓于1983年被发现，出土了李贤夫人的金戒指，戒面宝石上竟刻持飘带的裸体女性，应是粟特的生育女神阿娜希塔。可见，“喜胡风”是李小孩家的传统。

亚历山大东征后，“蓝宝石、红宝石、祖母绿、钻石、紫晶、海蓝宝石等南亚宝石，开始流行起来，青金石首饰的流行程度明显减弱”。李小孩的项链吊坠似无色水晶，底部涂衬蓝色颜料，可能在仿蓝宝石；手镯镶绿色方玻璃，可能在仿祖母绿……宝石切割规整，是粟特风，与亚历山大后少切割、用大粒宝石的“炫富风”不同。

长途贩运离不开强大的资本支持，古人难做到，丝绸贸易多呈“接力式”，时尚只能以一站又一站的方式，缓慢传递。

在李小孩墓中，出土24件玻璃器，学者刘晏裙指出：小型器多，实用器少，器壁大多很薄。既有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，也有西方的钠钙玻璃。

汉末战乱，秦汉铅钡玻璃体系瓦解，魏晋贵族“斗富”，玻璃是重器，多是西方传入的钠钙玻璃。李小孩墓中一些玻璃器是吹制而成，该技术来自古罗马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。在这些玻璃器中，有的技术上不如唐代李泰墓中同类产品成熟，可能是本土工匠仿西方技术，尚在摸索阶段。

本土工匠能学到西方技术，因当时都城大兴（唐代改称长安）有胡人聚居区，就在李小孩去世的第二年（609年），在名臣裴矩建议下，隋炀帝巡幸河左，在燕支山（今甘肃山丹县焉支山）下会见了西域各国国王及使节，与27国建正式联系。

隋朝开放、多元、外向，只是后来的唐朝更辉煌，掩盖了其光芒。

早逝可能也是一种幸运

李小孩墓在万善尼寺中。北周宣帝宇文赟荒淫，后宫设5个皇后，杨坚的女儿杨丽华只是其一，另有嫔妃宫女千余人，宇文赟死后，都被安置在万善尼寺。杨坚夺北周宇文家天下，致杨丽华衔恨，杨丽华作为前朝太后，可能也被送进万善尼寺，直到开皇六年（586年），她被封为隋乐平公主，才重返宫中。

杨坚执政24年间，度僧23万人，立寺3792所，写经46藏、132086卷，修故经3853部，造像106580区。

一方面，杨坚生在佛寺，由比

丘尼抚养长大，陈寅恪指出：“其开国首政即为恢复佛教……其家世及本身幼时之信仰，要为一重要原因。”

另一方面，学者李志鸿指出，六世纪末是中国的末法、法灭思潮高峰，人们普遍“有着强烈的宗教焦虑感”，杨坚在仁寿年间（601—604年）三次广设舍利塔，表面看是模仿阿育王，实是模仿北朝“邑义”。“邑义”是基层民众为办佛教斋会而结社。通过广设舍利塔，皇权直接抵达民间，强化杨坚的二元身份——受天命治理天下的皇帝；全国“邑义”法会的总发起人。

其实，为骗取权力的合法性，杨坚也利用道教。道士张宾、焦子顺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亲信，后投靠杨坚，把篡位包装成天意。杨坚在皇宫附近修“五通观”，任焦子顺为“天府柱国”。

学者付玉贞指出，杨坚行事似王莽，喜祥瑞、神化自己，在《隋书》中，他被写成“为人龙颜，额上有五柱入顶，目光外射，有文在手曰‘王’”。

谎话太多，说谎者自己也会上当。用迷信维系统治，结果杨坚也变得越来越迷信。晚年怀疑太子杨勇魔镇自己，错误地废长立幼。修仁寿宫时，累死多人，殿外“磷火弥漫，又闻哭声”，杨坚令巫师下咒，竟然“有效”。杨坚曾下诏：“畜猫鬼、蛊毒、厌魅、野道之家，投于四裔。”他的儿子隋炀帝更迷信。

李小孩去世时仅9岁（虚岁），属“薄命早终”，被当时观念排斥，认为是“对前世恶业的惩罚”。早在汉代，早夭者墓中便常有买地券，写“无责生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家室生人无殃，各令死者无适（通‘滴’）负”，意思是早死活该，勿纠缠生者。按习俗，李小孩“不能葬入其父李敏的家族祖坟，也没有夫家的族坟可入”，只能当无人供奉的孤魂野鬼。

李小孩自幼生活在宫中，得杨丽华喜爱，她只有杨家四分之一的血脉，与北周皇室更近——外祖父是北周皇帝宇文赟。杨丽华搬出“周皇太后”的身份，名正言顺。

杨丽华仿“佛教舍利瘞埋法”，葬李小孩于万善尼寺，“于坟上构造重阁”，假装在崇佛。这一套瞒不过隋炀帝，可朝中多北周旧臣，包括宇文族人，如宇文恺、宇文文化及等，杨丽华对他们有一定号召力，且杨丽华与隋炀帝姐弟感情融洽，隋炀帝未予追究。于是，李小孩违规葬在城内，距皇宫仅一坊之遥。

李小孩不幸早逝，可她也许是全家最幸运的人。杨丽华从北周皇太后沦落为隋朝公主，49岁便去世，此后隋炀帝猜忌李小孩的父亲李敏，在大业十年（614年）将其处死，年仅39岁，数月后，李小孩的母亲、杨丽华的女儿宇文娥英亦被赐鸩酒。

蔡辉 来源：北京晚报

丰子恺以笔 控诉日寇暴行

1937年11月6日，日机突袭没有军队驻扎的石门湾。这个江南小镇是丰子恺的故乡，5年前他用积攒的稿费在此建起一座小楼，取名“缘缘堂”，被他视为安身立命的归宿。

这一天，炸弹如雨，街巷顿时乌烟瘴气、鸡飞狗跳。丰子恺将一家老小聚拢屋内，“墙壁摆动，桌椅跳跃，热水瓶翻落在地，玻璃窗齐声大叫”。两个小时后敌机飞走，大街上尸首横陈、一片狼藉。

当晚，丰子恺率亲族老幼10余人乘船逃离。从此一家人踏上长达8年的流亡之路，经杭州、桐庐、兰溪、衢州，辗转来到江西萍乡。

1938年2月9日，噩耗传来——缘缘堂全部焚毁。数千册藏书荡然无存，弘一法师留下的画具画箱也化作灰烬。丰子恺愣在原地，悲痛欲绝。

但这位从不骂人的书生，终于在他的《还我缘缘堂》一文中爆发了。他痛斥侵略者为“狗彘豺狼”，同时写道：“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，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，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，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，身外之物又何足惜！我虽老弱，但只要不转乎沟壑，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，我的前途尚有帮助，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……”

一篇不够，他又提笔写下《告缘缘堂在天之灵》，追忆昔日温馨生活，痛斥侵略者毁灭文化家园的罪行；再写《辞缘缘堂》，深情告别故园，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苦难紧紧连在一起。三篇文章，一篇比一篇沉痛，字字是泪、句句是火，喊出了心底最深处的悲愤。到达汉口后，他感于民气旺盛，决意“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”。

直到1947年，丰子恺才回到阔别10年的故乡。

周星